

第五代学人丛书

主 编：杨匡汉 白 烨

林 祁 著

风骨

与

物哀

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206 7

第五代学人丛书

主编：杨匡汉 白烨

策划：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风骨

与物哀

林祁 著

二十世纪中日文学叙述比较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骨与物哀: 20 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林祁著.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4

(第五代学人丛书/杨匡汉, 白烨主编)

ISBN 7-5419-8396-9

I. 风... II. 林... III. 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中国、日本 IV. ①I206.6②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524 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 18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 插页 6 印张 146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9.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 天坛路 10 号 邮编: 710061 电话: 5247324

总 序

20 世纪对于中国社会的演进至关重要,20 世纪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举足轻重。“5·4”、“1949”、“1976”、“1997”,这些数字已不简单的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所包孕的历史内涵,所负载的时代情绪,已深深地印于人们的心海,铭入史碑的记载。在这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中国文学,也自然充满了大悲大喜的歌哭和大开大阖的曲折。而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一员,文学研究工作者对这一切更有着身临其境的体验和百感交集的体味,在身经和心历两个方面都与其研究对象——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密不可分。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造就了自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它在本世纪的最晚近的成果,可能就是造就了自己的“第五代”文化人。按照时下人们关于“代”别的看法,“第五代”约出生于 50 年代,成长于 80 年代,活跃于 90 年代。其在不同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已作为中间力量挑起事业的大梁。这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第五代学人”,有承继前几代学人治学传统的一面,但更有结合新的文学现实在兼收并蓄中铸造自己个性的一面。概括起来看,这主要是,选取问题比较注意人们不易觉察的盲点或众人纷说不一的难点;阐发问题常能有人所少思,人所未见;论文说理带有注重学理的明显特点。

当代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标志不仅是新一代学人的不断涌现与崛起,还在于在研究方法 & 治学观念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更新。文学研究较之以往,

紧贴政治的视角在逐步淡化,一统不变的观念也在更变,文学研究工作者都在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涅槃”,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自己。而这其中,由年轻的“第五代学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讲究学术本位和学理个性的追求,则更为豁人耳目。汇集于“第五代学人丛书”第一批的8位作者和8种著作,可以说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从而充分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五代学人”的已有风采和发展势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近年来吸纳了不少文学研究新人,其中“第五代学人”已开始在当代文学研究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展示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和加强当代文学研究事业,我们组编了这套以新选题、新思路、新见解为主的“第五代学人丛书”,望能藉以推进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的趋向,壮大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生力量,同时也为回眸世纪文学之路留下一代人忧深思远的理论思考。

杨匡汉 白烨

2002年4月6日,北京

目 录

导 论	001
1. 女性文学的定义	004
2. “20 世纪”——不仅作为时间概念	008
3. 文化背景:大陆的“风骨”与岛国的 “物哀”	011
4. 中日女性文学的世纪走向(概述)	016
第一章 作为“人”的女性觉醒	025
——中日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1. “弑父”精神中的女性神圣	025
2. “人”的文学中的爱情神话	034
3. “娜拉出走”和家的寓言	044
第二章 从“社会感伤”到自我表现	064
——中日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1. 中国:职业妇女的“中性”角色 日本:家庭主妇的“狂气”形象	064

2. “社会感伤”的“同构”叙事	
“通奸小说”的“解构”立场	083
3. 自觉·自虐·自审(“女性诗的时代”) ...	091
第三章 女性躯体的重新书写	116
——中日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1. 从无性的爱到无爱的性	118
2. 从“弑父”到“弑母”到“寻母”	131
3. 面对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写作(兼论“散文热” 现象)	142
结 语 面向 21 世纪的思考	159

附录:

20 世纪中日女性文学比较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导 论

世纪末黄昏的夕照中，笔者乘坐的国际航班从东京飞回北京。俯瞰一衣带水的两片国土，倾听百年风云在耳旁呼啸沉吟，心中获得一种超越的感动，任凭这个世纪的喜悦和恐惧、期待和挑战犹如乱云翻滚。

感谢现代航空奇妙地缩短了空间距离（航程只需三个小时），电脑、书本又把广漠的时空凝聚到书桌前，审视和操作就这样开始了。

是生活经历和性别体验，促使笔者把女性的写作与阅读，视为女性自我精神拯救的一种途径。当笔者以女性主义批评的眼光，重读中日文学史时，不能不惊异，长期被忽略在缝隙中而后逐步挤出地表的女性文学，竟如此丰富；女性写作真是一种欲望，一种奇迹，一种财富，亟待我们开发。

女性文学在20世纪以格外醒目的方式提出，女作家群在文学史上越来越享有重要地位。这与本世纪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这个世纪以来，中日社会及其之间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日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世纪是由古典向现代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

过程。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1]而女性文学则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浮出历史地表”^[2],得以渐渐丰富其自我表现。

本书选择现代化进程作为中日女性文学的重要背景,探讨在这两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第二性”是如何艰难地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的。在比较文学这一年轻的学科中,我们以往的研究偏重于中西而忽略中日的比较,较少致力于相邻国家共同而又极为不同的文学与文化的比较。本书选择独特的角度,宏观地全面地讨论现代化进程对中日两国及其女性文学的复杂影响。在双重意义上本书具有新意:即不仅是两个重要亚洲国家 20 世纪文学间的平行研究,而且是对两国女性文学的开拓性探讨。

笔者集中研讨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经历、文化传承与女性写作间的联系与影响,于是发现中日女性文学刚好有着时间颇为相近的三个发展阶段。它们彼此间的相近与相异,既显示女性书写共同的历史命运,又展现女性写作不同的可能以及女性作家不同的心路历程。本论文的“三个阶段”说,乃言他人所未及。一些较为新颖别致的观点也在比较中自然产生。

本书对这三个阶段中女性叙述(Discourse,可译为“话语”。见本页注)的异同的比较分析,触及以往文学理论甚少开掘的深层问题。

[本页注]:指的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过去对语言(language)的理解是:人是通过掌握语言(母语)而成为社会的一员的,而语言本身则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话语(的理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语言的内涵或者说意义与社会现实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又在人成为社会一员的过程中起着复杂的作用。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语言不只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而是社会影响人对现实的认识和形成观点的一种社会工具。参阅《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三联书店,1995),294页。

反思——用崭新的双眼回顾过去，以新的批评角度翻开过去的篇章——对女性来说，它不仅仅是文化史中的一个章节，更是其生存的一个过程。女性这种试图了解自己的做法，不单是为了寻求个性，而是为了拒绝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自我毁灭。以女性主义为内核对文学进行的激进批评恰是以此为宗旨，去发掘我们如何生活，我们的语言是如何束缚同时又解放了我们。我们需要知道过去的作品，而且要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有所不同；不是将传统延续下去，而是要打破它对我们的束缚。尽管，有时我们会有如履薄冰的困难和危险。^[3]

从论题可以看出，本文面对的是时间（纵）、空间（横）的两者之比较。除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以外，本文受惠于年轻的不拘一格的比较文学方法论。这两者都是20世纪最年轻的学科，并不完善，却生气勃勃，富于弹性，颇能把我们从传统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伸展我们的才能，拓宽我们的视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地平线（文学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关系。^[4]

比较文学是一场对话，一番追问。被比较的双方的历史意义和现时意义都只能在这场对话中被揭示出来。本文力求把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大致按照历史顺序展开对比，但不采取通常文学史的写法，不以作家论为基本体例，而采用主题分类，以史带论的方式，对本世纪女性文学丰富的现象和复杂的内涵进行整合（或曰：弹性聚合）。为防止只是以文学形象说明意识形态的弊病，为避免粗疏的泛泛而谈，本文侧重文学的内在因素，努力于作品的精读、细析和评价，甚至不惜篇幅于经典作品的评析（所谓“大题小作”），希望它们能起一以当十的效果。

1. 女性文学的定义

对女性文学,至少可以作以下三个层面的理解——

第一,女性写作的文学,即凡是女作家的作品都在此列,强调的是作家的生理性别。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日本早有所谓“女流文学”,中国亦有堂堂“妇女文学”,而在历来和当前的文论中,一般都指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虽然至今未有明晰的概念界定^[5];

第二,有关女性的文学。当然,这就不排除男作家有关女性生活内容的创作,同时不包括女作家的非女性生活内容的创作;

第三,也可以理解为女性主义文学,指有女性意识的文学创作及其批评。这一点,含有我们尚感陌生的新质,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的“新”,首先在于对传统男权文化的否定,“在研究女性体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而不是采用男性的模式和理论”。^[6]在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关于“妇女”(Woman)与“女性”(Women)是两个有差别概念。“妇女”是指女人对于男性社会派定的认同与屈就,而“女性”则意味着女人自己对于自身性别的确认与命名,已经隐含性别抗争的人权要求。本人认为,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伴随 70 年代西方女权运动传来东方的新女性主义思潮,才在中日先后出现了“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字之改,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在“性”(性别)意义上区别于在此之前者的“女流文学”、“妇女文学”等。“日文里‘妇女解放’与‘女性解放’两个概念内涵不同:二次大战前,‘妇女解放’意味着从国家主义、父权制下解放出来;二战后,大家庭裂变为核家庭,特别是受美国女权运动影响,‘女性解放’主要指‘性’的解放。因此日本

女性文学特以‘妇女文学’、‘女权文学’和‘女性文学’予以区分”。^[7]

其次,关于性(Sex)与性别(Gender)之间的区别。美国 70 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们指出:“性别”表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代表了男性与女性的文化特征。这种区别的内涵在于强调了影响男女两性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重申了西蒙娜·波伏娃著名的格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塑造出来的。”同时,它还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长期以来对性差含义的质疑,转向对构成差异含义的质疑。用唐娜·哈拉威的话来讲,就是“性别是一个在争取缩小性差异的概念”。^[8]日本很快就用片假名移植了这一概念,并在御茶水等著名高校设立“性别/Gender”研究中心。中国的女评论家也已开始这一课题的研究,如陈顺馨的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再次,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区别。“显而易见,两个说法的差异在于‘权’与‘性’。女权/女性主义就是研究性别和权利的学说。当然如果汉字里要有一个包括权与性的词就好了,但是汉语中却没有这个综合词,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所有的词都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含义……同许多 20 世纪中国新名词的来源一样,‘女权主义’一词不是出自中国人的杜撰,而是从日文中‘拿’过来的”。^[9]如今关于女权/女性文学,在日本更常见的是用日语的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Feminism。也许,这一做法有利于避免翻译的误差,把定义交给读者的理解力。由于我们的汉语不习惯这种翻译法,直至今日依然是“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概念同时并存。毕竟二者出于同一词源,确实难以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笔者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由于至今为止中日都不曾有过女权运动的剧烈形式,因此在比之西方“温和”的女性文学里往往混合了女权/女性的双重成分,“女性”已意味着女人对于自身性别的确认与命名,已隐含性别抗争的人权要求。而且,如今我们的女性文化已经跨入强调性别(Gender)的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10]使用“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能较准确地包容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鉴于目前在对“女性主义”的界定上,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理论背景的理解,笔者企图将以上论述的三个层面,统统纳入本文研究的史料范围。有时作者也只能把男作家的作品作为背景材料,如,易卜生创造的娜拉形象。同时,本文不愿重复常见的女性创作大集锦模式,只是轻松地再镶一次文学史的花边。因此,本文划定和描述的女性文学将始终坚持并把重点置放于女性主义的批评角度。女性叙述指的是女性文学在社会文化的性别意义上所赢得的话语权利及表现方式。

关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西方滥觞于60年代,经二十多年惨淡经营,纵横捭阖,大致形成英美和法国两大流派:英美好斗,力求反抗社会文化的性别歧视,侧重感性和经验式的文体;法派注重文本分析,长于女性创作研究,恪守对女性美学风格的兴趣。

挪威的女性文学批评家陶丽·莫依于80年代进入批评界时力图超越英美与法国二派,亮出自己的理论追求:理性应该摆脱性的强奸,恢复其自由之理的本质。避免因张扬女性价值而重蹈变相的性别主义——女性至上的偏激态度,改变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坛上的“情绪型”或“蛮干型”形象。^[11]这种

批评方法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

日本的女性文学批评受西方影响却有自己的风格，即细致入微，重精神的把握而不侧重于运动形态的概括。自上（上指的是上层知识分子）而下，涓涓渗透。而且，善于做内心的审视，有反省精神。我们经常指责日本社会太歧视妇女，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妇女状况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点，加上近代言论出版的自由，使西方女权主义热潮早在 60 年代后半期就涌入日本，比我国要早十几年。^[12]

在许多人眼里，欧美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是由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激发起来的，而中国的妇女早已随新社会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和男女地位的平等，认为中国没有从事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必要。事实上，政治上的解放和平等并不意味着男权意识的杜绝，男女精神的平等，女性身心的解放，更不能证明文学上女性书写的自由发展及必然成功。很显然，由于封建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我们很难摆脱思想上灵魂里的“又长又臭的缠脚布”。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刚刚开始，很有必要借“它山之石”，攻己之“玉”，建立我们自己的女性文学理论及研究。女博士陈顺馨对此深有感受，曾在论文里指出：“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可以说是多样化的，但不无艰难之处，因为女性批评也是写作的一部分，批评者亦跟她们的批评对象一样，要突破男性的规范，找出自己的路子。”^[13]

总之，女性文学这一概念，首先针对的是男性霸权的文学传统，是女性长期“缺席”的历史与现状。一旦文学史不再掩盖、排挤、歪曲女性书写，一旦女性真正获得“性别”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它的使命便可以光荣终结。笔者寄希望于下一世纪。

2. “20 世纪”——不仅作为时间概念

(一)中日文化在 20 世纪中的关联性。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仅是一种地理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概念。日本文化是接收大陆文化以后的文化。日语中的汉字是从中国搬过去后加上音读训读的，和服是从中国古代的吴服演变过去成为隆重的民族传统服装的。进入近代，日本被迫“开国”转而学习和摹仿西方文化，但无论怎样“西化”，却坚定而和谐地保存其传统。如，在中国曾一度受到忽视甚至否定的禅文化，便完整地保存在岛国，并演化为“枯山水”文化。正如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中指出的：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可以说都受过禅的洗礼，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禅宗影响的结果。^[14]并且，“禅被独立而系统地介绍到欧美，乃是日人铃木大拙”。^[15]又如，佛教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为日本历朝统治者尊奉，“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对日本文明的形成和社会历史的变迁起到巨大作用。^[16]

然而，向来以“先生”自傲的中国，在近代日本融合西洋文明而强大起来的事实面前，一下失去自傲的资本，不得不转而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因此政治方面有了效法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文化方面出现受日本文学影响的晚清文学改良和 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等。教育方面从 1896 年至 1937 年，赴日的公私学生便达五万多人。^[17]学习日本，通过日本这一“窗口”学习西方，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其中有新文学运动的宿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桌子的跳舞》中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18]这话并不夸张。近现代的中国作家往往是通过日本文坛学习欧洲和俄国的。

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关系如此紧密的“师生”之间居然反目为仇,1937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断了邦交,地理上的日本海像政治概念的血海深仇一样横在两个民族之间。直到中国“文革”后的“新时期”才开始解冻和对话,中日文化交流从此趋于频繁。

(二)20世纪对中日两国强调的是现代性。

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中日两国都经历了被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锁国之门而逼上近代化道路的痛苦过程。两国先后发生的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及本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等,都以挣脱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为特点,划出了历史的新纪元。伴随思想启蒙运动,两国关于人的文学蓬勃兴起;^[19]尔后,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贯穿本世纪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化焦点——“现代性工程”却是共同的,且不论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它曾表现为“古典性文化解体以后,以西方话语规范为参照系,重建中心文化的‘启蒙’与‘救亡’交织的话语实践”。^[20]尔后是“四个现代化”进程。显然,20世纪对中日两国强调的是现代化的重要性。

(三)对于女性文学史而言,“20世纪”的概念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开端无疑要推在世纪初始,下界要推到世纪末。^[21]

首先,女性文学和诞生于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密切相关。伍尔夫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精神分析学的世纪,开始理解环境的巨大影响和它对于性灵的启示。”^[22]戴锦华指出:“19至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而浮出地表的便是双重意义上的‘女性’,她既是一个实有的群体,又是一种精神立场,既是一种社会力量,又是一种文化力量,但最根本的是,她历史地注定要做父系社会以来一切专制秩序的解构人。”^[23]